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股份公 司

GUFEN GONGSI

FAZHAN SHILUN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日] 大塚久雄 / 著
胡企林 胡欣欣 /
江瑞平 韩朝华 / 译
朱绍文 / 校

发展史论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股份公司 发展史论

[日] 大塚久雄 / 著
胡企林 胡欣欣 /
江瑞平 韩朝华 / 译
朱绍文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份公司发展史论/[日]大塚久雄著;胡企林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ISBN 7-300-03992-8/C·192

I. 股…

II. ①大…②胡…

III. 股份公司-发展史-研究

IV. F27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2948号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股份公司发展史论

[日]大塚久雄 著

胡企林 胡欣欣 江瑞平 韩朝华 译

朱绍文 校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编100080)

邮购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E-mail: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75 插页3

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389 000

定价:29.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SAISON 文化财团赞助

编选委员 王洛林 堤清二
生野重夫 朱绍文

主 编 朱绍文

编 委 会 王 霁 朱绍文 朱 玲 朱荫贵
李 薇 江瑞平 陈 莹 陆华生
张京萍 周蔚华 林燕平 胡企林
郭连友 胡欣欣 韩朝华



大塚久雄先生



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总 序

为了实现祖国的现代化，“科教兴国”已成为举国上下为之奋斗的目标。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知历经了多少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付出了多少代价。回顾人类近代化的历史，所有发达国家在走上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无不以“科教兴国”为其先行条件。英国是近代最早走上产业革命道路、实现市民革命的国家，在受压迫的英国中下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推翻封建统治的时代，也是依靠划时代的科学革命，这种科学革命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园里看到英国启蒙运动时代的伟大科学家的足迹。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园里，一边是一幢古老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家詹姆斯·瓦特的名字命名的大楼；另一边是一幢以近代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命名的大楼，这正象征着一个国家要成功地走上近现代化的道路，实现国家的文明、民主和富强，必须以科学的发展为前提条件。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如人之双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也是为历史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美国、德国和日本，在 19 世纪落后于英国，在它们追赶英国，为跻身于世界大国之林、免遭淘汰而斗争时，也是首先认真地向先进的英国学习，引进英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缩短其落后差距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是在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去追赶发达国家的。然而在我国，往往侧重于引进属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技术、机械设备，以谋求工业化，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轻视甚至忽视培养建立现代社会科学队伍。特别是在原苏联模式的时代，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盛行，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位置，从而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科学”的名称是在 19 世纪以后才获得公认的地位的。在 19 世纪以前英国的大学讲坛上，一般都使用“道德哲学”这一名称。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抬头，“道德哲学”已不能涵盖资本主义各方面的发展，“社会科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通用的科学名称。社会科学在 17—18 世纪初得到了大发展。例如，霍布斯的《利维坦》问世于 1651 年；约翰·洛克的《政府论》，1690 年；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 年；卢梭的《人类不平等起源论》，1755 年；《社会契约论》，1762 年。在经济学方面，魁奈的《经济表》，1758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 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 年；休谟的《大不列颠的历史》，1754—1757 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 年，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说明“社会科学”是促进市民社会发展的新兴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问题和劳资纠纷也日益显著，从而也就出现了表达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的著作，所以社会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科学，因而必然也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

上面我们所列举的 17、18 世纪的几部经典名著，是受尽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皇权、神权和城市封建社会的压迫和剥削而奋起求解放的中下层人民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们都是寻求“人的解放”的科学指南。任何时代的进步的、革命的社会科学，都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作为经典的价值。社会科学的进步也仍然需要从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扬弃和创新。

所有落后的包括 19 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向先进国家奋起直追的时代，无不大力引进、消化和应用英、法等先进国家的社会科学。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教授对一位日本年轻的经济学家说，“日本人勤奋，教育水平高，吸取别国长处的能力很强，只要回顾一下明治维新以来就可以看到，日本在各个方面都很好地从国外学到了很多，这很像 19 世纪的美国。”（见 1999 年 11 月 23 号《经济学家》。）事实上明治维新以来，明治政府的宣言中的“五条誓文”中就有一条“广求知识于世界，大振国基”。100 多年来，日本被公认为世界“翻译大国”。直到今天，只要世界上有什么新的著作问世，不问其流派，不出一两个月日译本就出版了。特别是古典著作的翻译更是精益求精。例如，《资本论》的译本由权威专家翻译的先后就有五六种之多，其中的译者注释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译本。《国富论》的译本也是如此。古典文学、哲学等译本也是不断推陈出新，并以“文库版”的形式廉价出售，十分普及。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现代日本的社会科学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虽然日本的经济学家尚无人获诺贝尔奖，且是一个不足，但要知道日本原本是发展中国家，它要追赶发达国家，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吸取别人之长，使之本土化，以增强综合国力，当然就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有条件执国际经济理论研究之牛耳。何况像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并不真正代表现代经济学的最高权威，在评奖中亦有偏颇。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人们无不痛感

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之不足，而来自 21 世纪的各方面的挑战，又亟需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会科学知识。日本原为东方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着更多的类似之处，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它的现代社会科学对我国有许多实际的参考价值。多年来，我们偏重于欧美，而疏于近邻。为了广求知识于世界，对近邻日本，我们更需要深入了解。

我们组织编译这套《现代日本社会科学名著译丛》，正是力求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译丛所选的名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著作，而是现代日本学者所撰写、得到社会公认并对我国现实有参考价值的科学著作。本译丛获得了王洛林教授、堤清二博士和生野重夫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大力推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王霁博士给予了热情支持。由于现代日本社会科学的范围很广，我们的知识见闻实在有限，衷心希望国内外的朋友给我们以帮助和指正，共同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为整个人类做贡献，则幸甚矣。特此为序。

朱绍文



中译本序

随着我国加入 WTO，国际资本和外国企业必将涌入我国市场。如何迎接这场挑战，成为我国各条战线的当务之急。企业制度的改革成为增强我国市场经济竞争力的首要条件，而股份公司形态正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的“法律形态”。为了向我国学者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有关股份公司制企业形态的历史发展以及近代民主型股份公司形态的形成的研究，我们组织翻译了这本已成为“古典”著作的《股份公司发展史论》。本书看似只是对“股份公司”这一专题的发展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在研究叙述 17 世纪以来“资本集中形态”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近代资本主义为何从中世纪经过漫长岁月而逐步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大塚先生是日本西方经济史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的所有著作虽然主要以西洋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为核心，但他的目的始终是为了他的祖国日本的近、现代化寻求历史的借鉴。从他

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19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往往将所谓客观的实证主义作为其惟一规范，历史学家们企望从史料批判和整理中去寻求历史科学的所谓客观性。殊不知历史资料多而复杂，如果不用科学的理论去把握和分析，历史学研究必定出现自我分裂，缺乏对现实的科学的历史关心。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学家必然要忘记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热情和历史任务的责任感。

大塚先生的同窗好友，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已故著名西方经济史学家高桥幸八郎教授在1938年曾为本书写了一篇书评，提醒人们注意本书中的一些重要特点。首先，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进行了理论的、历史的深入分析，在建立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之后，才开始进入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不是相反。当然历史研究需要搜集资料，并要以所搜集的资料为基础，从中进行理论的抽象。但如果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单纯地罗列史料，那就不可能对历史史实进行科学的节选和叙述。理论和历史的统一只有在历史科学中才能得以实现。

其次，作者对历史的叙述采取了批判的方法。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股份公司形态的起源问题，已经有很多高水平的研究。作者对前人的劳动成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作了独特的理论史的叙述。作者在股份公司的本质形态，即资本集中形态以及它的结合与支配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其历史理论和历史分析的叙述。

第三，在本书下编第3和第4章对股份公司发展史的研究中，作者明确指出什么是股份公司发展的“近代的形态”，什么是它的“封建的形态”。这一点对于东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作者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出资人的民主权利，没有民主的“股东大会”，实行专制独裁的经营体制，所以它是“封建的形态”。在英国，1657年克伦威尔改革

以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始有了民主的结构。1662年，查尔斯二世承认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参加股东大会，实行民主经营决策，所以这是“近代形态”的股份公司制形态。现在看来，这种“近代的”股份公司形态已经成为“古典的形态”了。但对我国当前企业制度改革的研究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不要一听到“股份制”三个字就将其理解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代名词，而应当看看它的实体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经济关系，以及什么样的资本结合与支配关系。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股份公司形态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股东人数不断增加，股票证券化，股东投资于证券化的股票市场，并不直接或间接与企业经营有任何关联，最初的股东大会的民主决策的古典形式已经无法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大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完全掌握在经营者手中，形成了“经营者支配”的企业形态。在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有工人参加董事会的经营决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76年《新共同决议法》进一步规定劳资双方可对等地共同参与经营决策，这种趋势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制度改革来说，具有研究和借鉴意义。外国有些经济学家面对当前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形态，提出了“股份公司向何处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以为加入WTO后，照搬美国的企业模式就可以万事大吉。温故而知新，这本《股份公司发展史论》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探索新的道路。

本书的中译本得以问世，首先要衷心感谢本书著作权继承人高柳佐和子和井手正子两位师妹的帮助与大河内晓男博士的关心和热情帮助，感谢有斐阁社长江草先生和稼势政夫先生。我还要感谢俯允参加翻译工作的四位专家，没有他们的辛劳，这本中译本也无从传入我国。对一直关心本丛书进展并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周蔚华同志和陈莹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我个人的水平和条件，书中如有疏误，应由我本人负责。
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朱绍文

2001 年 9 月



初 版 序

—

贯穿本书的主要宗旨，是将股份公司的发展史作为资本集中形态展开史的一个环节加以阐释。

本书作者之所以对股份公司发展史这一表面上看来枯燥无味的课题产生学问上的浓厚兴趣，是从认识到这是资本集中史上的重要环节开始的。以往在公司形态史方面通常的习惯性见解（如利夫曼），都是按照两合公司产生于家族团体，合股公司产生于康曼达，股份公司产生于船舶公会这样的逻辑，将各种形态的产生理解为相互无关的、不存在内在必然性的过程。而这种把握问题的方法并没有传达出事实真相。凡公司制企业，都是资本的集中形态。我们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根据规律，也就是将各种公司形态的出现看做是这种资本集中阶段的表现，对其相互联系加以统一把握。本书作者在持有这一立场方法之后，开始对这一课

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虽然研究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这一方法另当别论。在本书中，作者始终努力从这一立场出发，对股份公司发展史进行探讨。

以上述观点研究股份公司发展史，必须彻底解决如下两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首先，从史料上来看，各种公司形态是按照合股公司→合资公司→股份公司的顺序分阶段出现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然而，为何如此则是一个问题。具体地讲，当以公司制企业的形态实现资本集中时，为何无法以同一种形态，比如说，在保持合股公司这一形态的状态下单纯实现其规模的扩大？而为何规模扩大必然要伴随着形态的转化，由合股公司转化为合资公司，再由合资公司转化为股份公司呢？对于这一难点，作者试图通过在理论上明确在公司制企业——广泛社会化的个别资本内部存在的**结合与支配**这两个契机来加以说明。因此，有关“结合与支配”的理论将成为本研究的一个基调。

其次，本应对应于相当高度的资本集中阶段的股份公司形态，却早在17世纪初期便已决定性地出现了。与此相联系，这种早熟地出现的初期股份公司与现代的股份公司有所不同，一般都未设置股东大会，而呈现出所谓专制型的结构。这又是为何？这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令人费解。而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指出，股份公司的产生，本来并不是作为现代资本集中而是作为资本主义以前的“前期性资本”集中而实现的，作者试图通过前期性资本的法则来解释这一问题。因而，有关前期性资本的理论成为本研究的另一个基调。

本书基本上是从以上两个动机出发来进行阐述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本研究中，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将重点放在理论性的把握上。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将相对地轻视或忽视实证。相反，作者将尽一切可能追寻最接近于历史事实的资料，以期正确

地把握史实，特别是对于那些重要而关键的问题更是如此。当然，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也完全应该如此。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我真心地企求并追求理论与实证的完美结合。作者平生一直相信，只有在理论与实证完美结合之处，科学性才赖以成立。然而，由于作者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时日尚短，无论从理论思考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的技术方面来讲，都还很不成熟，本书仅仅是作者的一部习作。因此，本书作者充分认识到书中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证方面都会存在不少不成熟或谬误之处，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加以改正。各位前辈及同辈学友如能给予宽厚指正，作者将感到不胜喜悦。

二

本书的写成，得力于很多人的帮助。即使在此暂且不提作者通过先辈们的著作、论文所获得的教益，回想起研究过程中各位前辈、同辈学友给予的指导和激励，仍充满感激之情。特别是恩师本位田祥男博士的教导更是令我难忘。就在本书作者毕业以后，下决心致力于经济史研究之际，本位田博士将本书的课题交给了我。在此后的8年岁月里，我不仅在研究方面得到先生的指导，而且在珍贵文献的阅读方面多承照顾，甚至连本书的出版也是得到了先生的帮助。与原计划相比，本研究的完成一拖再拖，对此我深感歉意。想到本书终于问世，现在总算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回报恩师，犹如肩上卸下了重担。此外，在本研究的进行过程中，作者从昭和八年起的3年间得到了由已故的日下义雄先生赞助设立的日下奖学金的研究费资助。在本书中经常引用的很多宝贵文献，正是由于这些资助才获得的。今天，当这一研究终于告一段落之际，在此向该基金会表示深切的、由衷的谢意。另外，作者非常感谢有斐阁的主人江草四郎氏能够爽快地承接本书

的亏本出版。在此，还要深切感谢在研究过程中协助收集文献资料的国际书房的服部正乔氏以及对繁琐无比的校正工作给予理解和帮助的有斐阁的田中久吉氏及其他各位。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利用了曾在《经济学论集》、《社会经济史学》、《经济志林》和《商学论丛》等杂志上发表过的很多文章的片段或全部。应该说，本书是在对以往发表的文章加以全面补充修改之后将其统一成书的。在此也向上述各杂志编辑人员的厚意表示感谢。

1938年2月